

胡適與他的學生

李又寧 主編



南京大學出版社

胡適與他的學生

李又寧 主編

南京大學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与他的学生 / 李又宁主编. — 南京 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305 - 15936 - 7

I. ①胡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胡适(1891~1962)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5567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书 名 胡适与他的学生
主 编 李又宁
责任编辑 李鸿敏
封面设计 接祖华

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7.25 字数 251 千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305 - 15936 - 7
定 价 48.00 元

网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官方微信号: njupress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 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为什么研究胡适？（代序）

李又宁

时潮和国难的冲击下，地裂山移，种种空隙、空间、空洞逐渐出现，“空”有多种意义，其中包涵“变”和“通”。因为有了“空”才可能搭起新舞台，才有种种新戏，不断上演，如新文化，新文学，新教育，新科技。在许多戏中，胡适是编导、策划兼主角。他的朋友和学生们纷纷上场，各显身手，并与坚持祖制者较量交锋，唇枪剑戟，不但热闹非凡，而且成名后各立山头，开辟了许多机会之路与就业之道。试看看，20 世纪中国的许多领域，都与胡适有或多或少的渊源，也可以说，他是一位祖师爷，在新世纪中，似应居于“老”字辈。

我喜欢买书，到处买书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我多次到中国大陆，也到处逛书店，所购无多。1989 年春夏，我在北大校外畅春园住了几个月，做点历史研究，看了几个著名的图书馆。我发现，但并不惊奇，有关胡适的专著，只有“批判”之类，渐渐地起了一个研究计划的意念。众所周知，胡适是留美的，在美国有不少关于他的史料，可以想法子去搜集，所以邀集了十余位学者专家，如余英时、张朋园、周明之、周质平，于 1990 年 4 月 6 日，借第 42 届亚洲学会年会，在芝加哥普尔梅饭店（Hotel Palmer）正式宣布“胡适研究国际学会”（简称胡适研究会）的成立。会址在纽约。余先生是会长，张先生及二位周先生都是副会长，区区聊充理事长兼董事长。同时，胡适研究会经申请成为亚洲学会（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）的一个分会（affiliate member），并在同年的年会中，举办了两场相连的小组



讨论,题为“胡适与他的朋友”,张朋园、周明之、周质平和我各提出论文一篇,余英时及 Michael Gasster 分任两组评论人,听讲者近百人,可见题目甚为引人。这是胡适研究会的首次学术活动,也是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试验。

人物研究的新试验

一个人是社会和历史中的一个点,无论大小,总还是点。有影响力的人物,能从自身的点与别人的点连系起来而成为线,再由线的交织构成面,面的组合可构成体。点、线、面、体间的关系,可以是无形的,如感情和思想;也可以是有形的,如社团和组织。无形可演为有形,有形可化为无形;无形和有形,可以并存,也可以并失。胡适和他的许多交游,包括朋友和论敌,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,其间的点、线、面、体之中的多样关系及多种演变,错综复杂,都是社会的一部分,都是时代的一部分,都是饶有趣味而且富有意义的历史题目,从中不但可发掘多样的个人史料,而且可发现个人与社会、个人与时代的多样关系。普通的人的生命发展及日常生活,离不了团体、社会与时代,历史人物更是如此。把个人的历史,与社会的历史及时代的历史联系起来,加以具体的研究和分析,寻找多样的关系,是不是会使历史研究的内涵更加丰富呢?更增加变化呢?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?胡适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缩影。在研究他的过程中,我们同时研究与他相关的许多缩影,是不是一举多得呢?而且,所得的不是不相联的一些单独个人的资料,而是相联的人与人之间的多种环节,多种横切面。如果研究的只是一个人,所重的多是直线的发展,就不容易看到此人周围的种种环节及此人发展过程的种种横切面,也可以说,不易见到此人周围的小环境和大环境。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,不妨试用这里所提的方法来弥补。

中国的史学,反映了中国的哲学、文化和社会,一向强调人在集体中



的社会和政治任务，而不以个人有其内在的、自己的价值为重。人的社会任务和政治地位，常是史传类集群分的尺度，男性如帝、王、将、相、臣、吏，女性如后、妃、母、妻。其中再加上一些道德的区分，如忠臣、孝子、贤淑、贞洁等等。各种史传，不论是中央或地方编的，多以群分或类集；传主有群性，而没有个性。给人的印象是：呆板、木讷，缺少鲜明的素质。

20 世纪的中国传记，有很显著的多方面的进步，内容丰富多了，叙述详细多了，并且还有种种的分析。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为数不少。但是，20 世纪也有它的问题。崇尚革命，革命史是史学的重点，革命人物成为敬礼的对象。人物一旦进入革命史，就带有革命性，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几无不表现其革命性。革命性有数类，各类之中有共同点。带有某一类的革命性，历史人物的类性非常醒目，好似穿了一套制服，挂着烈士或英杰的徽章，四周有重重的光圈，看上去也颇相似。当然，还有反革命、党派、流派、宗派、主义、阶级等等。每一项之间可以组合。每一项之下又有类别。名目繁多，令人眼花。还有“成分”说、“出身”论等等。不管被派定属于哪一种类型，都必须在历史中表现其特定的类性或“成分”，好似穿着特定的制服、戴着特定的帽子、挂着特定的标志、做特定的事、说特定的话。除了名字和头衔不同之外，其他也差不多，难以分辨。这些新式的制服和帽子，虽与传统的衣冠有异，所起的作用略同，却都把每个人的个性和特色掩盖了，抹杀了。又因为新式的名堂比老式的要庞杂，变化也快速，令人应接且不暇，还有什么时间去分辨呢？又有什么空间去表现自我呢？

像胡适先生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，面很广，层很深，环节很多；关于他的看法很多，争论也很多；因此不易研究，更不容易研究得面面俱到、层层均详、事事皆周。他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层面，各人有各人的才学和性格；他与这许多人的交往经过、知识和感情上的交流、学术及思想上的异同等等，都很值得详细研究，而又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。与他有关系的种种社团，各有各的宗旨，各有各的成员，各有各的演变；他与它们的合与分，为什么？怎么样？也都很值得深入研究、



仔细分析,而又非一二学者专家所能殚精竭虑、巨细靡遗,或在每一项的分析上都做到绝对的客观。

学术研究的艰辛和困难,我们了解;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,我们尊重;历史之前人人平等,我们深信。不是空言自由、平等、独立,而是具体的实践,在历史研究中实践。怎样从胡适的交游的角度来看他,来看他(她)们共同的世界,是本计划的一部分,所以博采诸家的专长、广纳多种的看法。所邀请的作者,很多并不专研胡适,而是对他的某一两位交游有独到的研究。这样,胡适有他的发言权、有他的辩护人;与他相交者也各有发言权,各有辩护人。多人对话、交流、沟通,总比一人独白要民主一些、要开放一些、要公平一些、要现代化一些。

现代化意味着个人化,每个人做他(她)自己,有自己的精神和生活空间。这本论集及相关的集子,希望能提供一点空间,让历史人物及史学工作者开讲演会、谈话会,各展其才、各显身手。用台湾时髦的话说,让大家作秀,是卡拉OK式的各抒情怀,你唱我唱他(她)也唱。谁的秀作得好,谁的歌唱得棒,请各人自己打分数。庄子如在场,他会说:不用打分数,分数没法打。《庄子》,我还没读透,所以仍然喜欢咬文嚼字,把这种聚会称之为历史的多元化,又因常常离不开英文,免不了自译一下:pluralization of history。

这里所说的多元,不仅是人数,同时意味着每个人有其个性,有其特性。

由于这种想法,承蒙海内外学者专家的支持,从1990年底推出了胡适研究系列,即《胡适与他的朋友》(6册)、《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》(2册)、《胡适与他的家族与家乡》(1册)、《胡适与国民党》(1册)、《胡适与民主人士》(1册)、《胡适与他的学生》(2册)。这些书都是纽约天外出版社以正体字出版的。现今的《胡适与他的学生》(1册),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出版,内容与天外版的有同有异。在筹划中的尚有《胡适与他的论敌》。

名师与名牌

组织邀请各地的学者专家研究胡适的同时，我自己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，其中之一就是：为什么胡适会有众多的学生？相形之下，为什么中国其他的学者，或是外国的学者，没有这么多的学生？

这个问题，可以有不同的答案。

首先，时代需要变异，变异需要有领导。胡适能想能说能写能讲能教，是中国第一学府的第一名牌教授。尽管时代求变，但尊师敬道的传统深植人心。数千年来，对华夏士子而言，名师是一生最好的名牌，比穿什么戴什么都重要。作为新时代的导师，胡适门下的学徒数量，不但西方所未有，杜威哪能及！连孔老夫子恐怕都会自叹不如。但是，他也可能在叹息中有些许安慰，毕竟遗风犹存之下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中国历史上的名师甚多。但是，有几人能对他们的当代社会及文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？又有几人的徒子徒孙广布多种行业，甚至于跨洋过海，流芳域外？！

胡适与他的学生，能产生广大深远的影响，必定有多种的因素，其中之一应当是：他们多是留学美国的。170 年来的留美史是值得深度研究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胡适研究系列开展之后，努力提倡华族留美史的研究，因为我更深切地体会：胡适不是个体，也不只是一群人的一个代表；从他的生命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华族历史的一些走向，甚至人类历史的某些走向。

青少年时代，我就被灌输了一些现成的学说，例如：华族素来“安土重迁”，对外界不感兴趣。到美国后，又吞下了一些汉学家的理论，以为中国人有仇外的积习（xenophobia），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战乱是个实例。等到我自己开始教书，在讲堂里如法炮制一套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，因为如此说法，有些文化和历史现象无法解释。经过了一番怀疑和思考，其间常以胡适留美史、中华民族境内移民史、华族移民海外史为实例，



我得出一个结论，前人多以偏概全，以部分论整体；事实上，自古以来，华夏民族多种多样，思想和行为都不可一概而论。“安土重迁”者，固然不乏其人；喜好海阔天空者，也大有人在。否则哪有庄子之说，哪有“空灵”之论，哪有丝绸、瓷器、香料、茶叶之路，哪有古代航海史，哪有中西交通史，哪有当今的留学潮、移民热！空间之美，华夏知识分子早就发现，早就心向往之，只是碍于现实，只能当作一种理想、一种梦想。海禁开放以后，国人因祸得福，能够到海外去打工、去发财，去留学、去求知。其中的心酸和屈辱，只有亲历者知道，却不愿张扬。为什么？为的是面子，为的是生存。胡适和无数留美者，都经历过种种的种族歧视和偏见，但在他们的文章中是不易看到的。绝大多数默默地接受了，因为留美意味着多种空间的享用，如理想的空间、精神的空间、知识的空间、感情的空间和行为的空间。而且，他（她）们的身体里，流淌着“水文化”。水的特质是低调、谦虚、灵活、博采、包容、忍耐、融合、奉献、净化。集结起来，就是：正面思维、乐观努力、积极生存、顺势而进。因此，从历史上看来，华夏民族是由小而大。19世界中叶以后，历经战乱，九死一生。然而，由于传统的“水文化”，我族不断向海外发展，在世界各地发展前所未有的空间，美国是其一。美国是大国，它所提供的空间也是广大的，而且有优质的各种资源，天然的与人文的。胡适和他的学生，帮助当代及后世去发现和开发这种种的空间，可以说是功德无量，值得今人去回想和纪念的。

2015年5月14日

重写完成于纽约市



目 录

- 李又宁 为什么研究胡适? (代序) / 1
- 王汎森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/ 1
- 吕景琳 朱宗震 傅斯年——胡适的学生和诤友 / 24
- 罗久芳 胡适与罗家伦 / 59
- 潘光哲 胡适与罗尔纲 / 96
- 陶英惠 胡适与杨联陞 / 146
- 蔡登山 胡适与徐芳 / 186
- 潘光哲 徐芳女士访问记录 / 203
- 李又宁 后记 / 242



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

王汎森*

几十年来胡适(1891—1962)与傅斯年(1896—1950)常被当作同一个学派。在政治上,中共所发起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,提及胡适的“党羽”时必提傅斯年。^①在学术上,提到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时,亦必提到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这个运动实际的中心。他们两个人关系之密切,不言而喻。当傅斯年病逝时,胡适所发表的纪念文字尤其证实这一点。胡适提醒大家: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。同时,胡适在195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着:

* 王汎森,台湾云林人,1958年生,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,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,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。台湾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“中央研究院”副院长。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到民国时期之思想史、学术史。

① 关于胡适与傅斯年这个题目,已有人写过,但颇有错误。如蒋星煜《胡适与傅斯年》(刊于《山西师大学报》[社会科学版]20:1)一文中说:“1918年3月15日,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作了《论短篇小说》的演讲,傅斯年已经毕业,在研究所当研究员,他为胡适记录后,即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刊出。”(第85页)所谓“毕业”是不了解当时北大学制的说法。研究员可以是大学本科毕业生,也可以是高年级学生,而傅斯年属于后者。又如说傅斯年当时由黄季刚的得意门生转而追随胡适,“人们对之迷惑不解,陈独秀写信给周作人,怀疑他是什么人派来的奸细。胡适只觉得他恭顺可爱,第二年就让傅斯年用庚款到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去留学了”(第85页)。是否“恭顺可爱”没有材料记载,不过傅氏赴英念书是考上山东官费,既不是过去所传是受穆藕初资助,也非此处的使用庚款。胡颂平编著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(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84年),第2932页:“今天蒋复璁带来民九、民十两年的北京政府教育公报”,“编者附记:在附录里,还有傅斯年当年考取出国的分数是八十二分,第二名”。为了这次官费考试,还有一个插曲,即许多考官因为傅斯年是激进学生而不拟录取。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科长陈雪南出面力争,认为成绩如此优秀的学生非取不可,终于定案。值得注意的是,此后陈雪南与傅氏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,1948年,傅在美国,竟被国府选为立法委员,傅氏不就,也是经陈雪南劝说才接受的。

今天下午四点半，宋以忠夫人（应谊）打电话来，说 AP 报告傅斯年今天死了。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！孟真天才最高，能做学问，又能治事，能组织。他读书最能记忆，又最有判断能力，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。在治事的方面，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，第二次在中研院史语所。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长，办理复员的工作。第四次做台大校长，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。^①

因为胡、傅二人在生活、学术上异常密切，故大家在注意到二人的相似处之余，竟常忽略了二人的相异之处。也因为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，所以一般只留意胡适对傅的影响，而少探究傅氏对胡的影响。

在傅斯年结识胡适的三十五年中，同在中国的时间，只有不到十五六年（北大两年，1927 年至 1937 年，1946 年至 1948 年），其余时间皆相睽隔，而同在中国的时间内，且住在同一城市者，只有在北京的几年。

胡适与傅斯年的关系有过几度变化。毛以亨（1895—1968）回忆说，1916 年（应为 1917 年——编者按）胡适初到北大后数日曾讲墨子，毛与傅斯年去听，未觉精彩，所以胡适与马叙伦（1884—1970）所共同指导的十六个研究员中，十五个人跟随马叙伦研究老庄，而只有班长赵健一人与胡适研究墨经。当时整个学术风气尚未转变，章太炎学派仍占主流地位，太炎弟子马叙伦吸引大量对文史感兴趣的学生是很自然的事。毛以亨回忆说，当时他们听完胡适的墨子演讲：

回来觉得类于外国汉学家之讲中国学问，曾有许多观点，为我们

^① 《胡适的日记（手稿本）》（台北：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1990 年），1950 年 12 月 20 日条，无页码。

所未想到，但究未见其大，且未合中国之人生日用标准。^①

在新文化运动时期，胡适与傅氏关系变得极为密切，胡适是《新潮》的指导老师，而傅是《新潮》的主编，又是胡适心中在旧学根柢上极令人敬畏的学生。可是傅斯年在欧洲游学近七年而未得任何学位，在胡适看来是一大失败，故1926年胡适日记上便记有，傅斯年甚“颓放”，在欧游学而无所成之类的句子。此外，日记中并涂去九行显然对傅不满的评语。^②不过，他也感受到傅斯年许多精辟的见解，故同期的日记中不时有这样的句子：“谈得很好”，或说傅氏精彩的论点太多，“不及记下”。^③

当时胡适显然是拿傅氏与顾颉刚(1893—1980)相比。顾氏在《新潮》时期并未占有傅斯年般显著的位置。不过他后来因为替胡适访求与《红楼梦》相关的书籍，又与胡适共同发起标点出版《辨伪丛刊》，怀疑上古信史，而名满天下。当1926年胡适与傅斯年在欧洲相见前，《古史辨》第一册已结集出版，震动一时。^④其声光之盛，自然使得胡适对眼前的傅斯年感到失望，故胡适在当时日记上说傅斯年不及顾颉刚之勤。^⑤

傅氏回到中国后，在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(文学院院长)，曾多次电邀胡适到中山任教，甚至将课程预先排出，但最后胡适仍未前往。傅与顾颉刚同任教于中山大学时，两人关系急速恶化。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中收有顾颉刚向胡适控诉傅氏专权任性的信件。胡适将攻击傅斯年的信给傅氏

① 以上皆见毛以亨《初到北大的胡适》，原刊香港《天文台》，无日期，见“傅斯年档案”(以下简称“傅档”)I: 1696。

② 这九行在《胡适的日记(手稿本)》，1926年9月5日条，无页码。它们可能是胡适决定将日记交傅氏在台代为保管时涂去，或是胡适重读日记时抹去。

③ 《胡适的日记(手稿本)》，1926年9月2日条。

④ 而后恒慕义(Arthur Hummel)还在地位极高的《美国历史评论》中撰文介绍。Arthur Hummel, "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", *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, Vol. XXXIV, No. 4(July 1929). 此文亦收在《古史辨》，第2册，第421—443页，后附中译。

⑤ 《胡适的日记(手稿本)》，1926年9月5日条。

看过后,引起傅、顾两人极大的不快。^①

1929年,史语所迁北平,当时胡适在上海,不过自1930年以后,胡适与傅斯年便因同在北平而常有见面的机会。胡适日记中屡屡有傅斯年今夜来访,或谈身世,或谈上古史事。胡适认为傅氏在当时上古史之见解当不做第二人想。其中胡适对史语所年轻人才的训练及成绩尤其感到惊喜。安阳殷墟发掘的成果也深为胡适所欣赏^②,其日记中甚至还保留了当时媒体报道史语所的剪报^③。这些事迹皆使胡适对傅斯年的印象改观,同时胡适与顾颉刚也日渐疏远^④。整体而言,从1926年起,傅斯年在三方面对胡适有所影响。首先要谈胡适古史观由疑而信的过程,及傅斯年在此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
傅斯年对胡适古史观有两个方面的影响:第一是由“疑古”到“重建”,第二是多元的古史观。而这两者其实也有相会合之处,即多元的古史观其实解决了古文献中的一些矛盾,而使得原来认为是古人作伪的,现在可以别有合理的解释。

胡适、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皆倾向于疑古。胡适在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中说《尚书》“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”,“无论如何没有史料

① 顾潮:《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时代的交往》,《文史哲》,1993:2,第17页。从最近公布的一封信顾氏给胡氏的信(此信并未包括在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中),可以发现傅、顾两人的冲突或有另一原因。在这封信中,顾颉刚希望由他与胡适分史语所之权:“……最好,北伐成功,中央研究院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搬到北京,由先生和我经管其事,孟真则在广州设一研究分所,南北相呼应。这也须先生来此商量的。”耿云志主编: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(合肥:黄山书社,1994年),第42册,第353-354页。

② 《胡适的日记(手稿本)》,1935年6月6日条,无页码。

③ 《胡适的日记(手稿本)》,1930年2月12日条,无页码。

④ 胡适与顾颉刚感情之渐趋疏远,应该是当时人所感得到的,所以当时顾颉刚的学生何定生出了一本《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》,此册不能得见,不过可以从顾氏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看出其大概:“有一件事情,使我很不安的,是何定生君出了一本《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》,趁我不在北平的时候,用话骗了朴社同人,印出来了。其中文字,有几篇是广东做的,先生已见过,有几篇是新近作的,其中对于先生颇有吹索之论。这也不管,他不该题这书名,使得旁人疑我们二人有分裂的趋势,而又在朴社出版,使人疑我有意向先生宣战。”顾潮:《顾颉刚年谱》(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3年),第172页;顾致胡信,见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,第42册,第402页。



的价值”。^① 后来相信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(Johann G. Anderson, 1874—1960)的臆测,认为商代的中国仍是新石器时代。^② 他同时也受晚清今文家疑伪思想的影响,在1919年的井田论战中,一再说《周礼》是伪书,王制是汉朝博士造的^③,而且又强调东周以前古史不可信。傅斯年在《新潮》的文章中偶然也说东周平王以后“始有信史可言”,或是夸赞《史记志疑》等疑伪之书的价值。^④ 可是到了1926年左右,从欧洲留学回来后的傅斯年对古史的看法已有改变。但当时胡适还很支持顾颉刚《古史辨》的工作,并乐道其实验主义方法在《古史辨》上的大成果。^⑤

傅斯年对古代历史由疑转信的过程是逐步发展、逐步调整的,1924年至1926年,此征兆在傅氏断续写成的《与顾颉刚论古史书》中已露出。此时他对于古史信多于疑,虽然处处还流露着晚清今文家疑伪的口气,而且认为尧、舜、黄帝等可能是传说,但态度已大大不同,而且商、周为东、西二集团的初步想法,以及东夷一地(渤海湾一带)是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之想法也已隐然成形。虽然因为沾染今文家说而对《左传》等书的态度仍有所保留,但基本上已信过于疑了。而且觉得今文家怀疑是古文家伪造的许多东西必有很长的渊源,不可能只是顺应政治需求而造出的。^⑥ 傅氏回国以后,回过头来治中国古代文史之学,从《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——一个短记》等文章便可发现,他已发展出一些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

① 胡适: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(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78年),第22页。

② 见《古史辨》,第1册,第120页,胡适写信告诉顾颉刚:“发现澠池石器时代的安特森,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(新石器时代),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。”又《胡适的日记(手稿本)》,1930年12月6日条:“如我在六七年前,根据澠池发掘的报告,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。”

③ 《胡适文存》(台北:远东图书公司,1990年),第1集,第430—431页。

④ 傅斯年:《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》,《傅斯年全集》(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80年),第4册,总第1231页;《清·梁玉绳著〈史记志疑〉》,同书,总第1417—1419页。

⑤ “傅档”I: 1678。胡适1926年8月24日致傅斯年信,信上说:“颉刚在他的《古史辨》自序里说他从我的《水浒传考证》里得着他的治史学方法。这是我生平最高兴的一件事。”

⑥ Wang Fan-sen, *Fu Ssu-nien: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0), pp. 110—114.

论述。^① 不过五四这一代青年基本上对传统文献没有太大信心，他们相信的是运用科学从地下发掘的成果。从 1928 年起，安阳殷墟的发掘逐步使傅氏相信古史辨派过疑，故此以后文章常驳古史辨派。如“《新获卜辞写本后记》跋”中，便因“命周侯”一段甲文而怀疑古史辨派所提的商、周不相臣属之说。^②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在傅斯年的一本题为“答阑散记”的笔记本中，发现一则短篇讽刺小说《戏论》。这一则小说无法断代（大约写于 1930 年），文字潦草凌乱，极不易辨认。^③ 全文是讽刺钱玄同（1887—1939）及顾颉刚的，尤其针对《古史辨》最核心的方法论“层累造成说”，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。而这个方法论正是他过去认为是顾颉刚“将宝贝弄到手”的“宝贝”，现在却讥为荒诞之至。这件档案在近代疑古思潮衰退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史料，我将全文放在附录中。^④

殷墟中出土的大量器物，尤其是精美青铜器，也打破了胡适原先持之甚坚的“商是新石器时代”之说。1930 年 12 月 6 日，他在史语所演讲时便承认：

在整理国故的方面，我看见近年研究所的成绩，我真十分高兴。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洹池发掘的报告，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，今安阳发掘的成绩，足以纠正我的错误。^⑤

此处所谓“商代为在铜器之前”，其实是一婉转的说法。六七年前，胡适认为商是新石器时代，而不是“铜器以前”。足见殷墟考古对其古史观

① 《傅斯年全集》，第 3 册，总第 739—744 页。

② 《傅斯年全集》，第 3 册，总第 959—1005 页。

③ 我曾于 1990 年，将其中一部分译成英文，附在我的 *Fu Ssu-nien: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* 后，pp. 205—206.

④ “傅档”II：910，杜正胜先生的隶定刊于《中国文化》，1990：12，第 250—251 页。

⑤ 《胡适的日记（手稿本）》，1930 年 12 月 6 日条，未标页数。



点产生的重大影响。而这一修正作用应该早从 1928 年底或 1929 年殷墟实物出土就已开始了，所以在 1929 年 3 月 11 日，当胡适还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，顾颉刚因辞了中山大学而顺道过访，胡适告诉他：

现在我的思想变了，我不疑古了，要信古了！^①

顾颉刚说：

我听了这话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。后来他回到北大，作了一篇《说儒》，说孔子所以成为圣人，是由于五百年前商人亡国时有一个“圣人”出来拯救他们的民族……这就是他为了“信古”而造出来的一篇大谎话……宜乎这篇文章一出来，便受到郭沫若的痛驳，逼得他不敢回答。^②

在 1951 年批判胡适的座谈会上，顾颉刚说：

我本是跟着他走的，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。

固然我所说未必对，可是他自己却已“宁可信而过，不可疑而过了”……钱玄同先生曾在 1936 年对我说：“真想不到，适之的思想会如此的退步。”^③

胡适这一重大转变应与殷墟发掘有关。胡适的疑古是有特色的，他

① 顾潮：《顾颉刚年谱》，第 171 页。

② 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？（上）》，《中国哲学》，第 2 辑，第 341 页。郭沫若的驳文见他的《青铜时代》。

③ 《大公报》（上海），1951 年 12 月 16 日，转引自刘起钎《顾颉刚先生学述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），第 263 页。

